

1006

建湖文史選輯

第六輯



封面设计：刘汝沧

封面题字：杨 豪

责任编辑：赵庆荣

建湖文史选辑第六辑

建湖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编 审：朱建华

副编审：赵庆荣

编 辑：游益培 徐瑞祥 陈远立

杨树晴 曹震霖 赵庆荣

出 版：一九九四年二月

印 刷：建湖印刷厂

印 数：1—2000册 工本费：2.50元

目 录

江阴要塞起义始末·····	唐秉煜 (1)
建湖镇的历史变迁 (建国前部分)	
·····朱建华 赵庆荣 陈衡志	(74)
上冈角头街与宋氏家族·····	夏瑞庭 (93)
孙仲强与孙家桃园·····	夏瑞庭 (97)
富而仗义 仕则惠民	
——晚清北马厂马氏知名人士事略·····	李世安 (99)
文坛妙手陆象周·····	赵庆荣 陈衡志 马效良 李世安 (104)
一代外科名医胡海鳌·····	李世安 (107)
盐城西北乡佛教概况·····	赵庆荣 马效良 李世安 (109)
漫话建阳三座古桥·····	张瑞楨 李世安 赵庆荣 (116)
建湖县第九届政协组织概况·····	赵庆荣 (119)

写在《江阴要塞起义始末》前面的话

江阴要塞起义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后期开创的使敌难以言状的又一历史壮举，具体组织、领导这次起义的同志和主要参加者中，建湖籍的就有唐君照、唐仲衡、吴广文、唐秉煜、唐秉琳、唐坚华和唐芬等同志，他们以各自的光辉事迹谱写了曲曲动人的诗篇，为家乡人民争得了光荣和骄傲。

早年打入敌部，时任要塞工兵营长的唐秉煜同志返乡探亲时，将他几经修改的《江阴要塞起义始末》一稿献给家乡人民，我会觉得此稿确系难得的“三亲”史料，故予全文刊载，以飨家乡人民和广大读者。

建湖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江阴要塞起义始末

唐秉煜

岁月如江河直泻，弹指已逝三十九年，我由当年满头青丝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觉已成为年近古稀的白发老人。对

于我党领导的江阴要塞起义，已有不少回忆文章，由于岁月遥远和其它一些原因。其中有的内容不尽准确，甚至出现严重讹误。如李宗仁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涉及江阴要塞起义时说：“三、四月间，我得到情报说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已秘密与共军接洽，预备于共军渡江时叛变响应。我特为此事与参谋总长顾祝同计议。顾认为流言不可轻信。……熟知四月二十一日共军渡江时，戴戎光果然叛变……戴戎光可能不纯然是为着五百根金条而叛变的。”（《李宗仁回忆录》第九六四页）全国解放后不久，南京军事学院编写的教材中称江阴要塞起义是“被迫举行的战场起义”。直到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某军事学院训练部编写出版的《渡江战役》一书中还说：“在我强大攻势及争取工作相互配合下，江阴要塞之敌于二十二日宣布起义。”而我三野十兵团在江阴渡江的先头部队第二十九军政委张藩同志撰文干脆说江阴要塞“所谓唐秉琳起义云云，纯属虚构。”除此，还有其它一些不实之词。（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六辑第一九六页，一九八一年八月版）（俞兴茂同志已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五辑《唐秉琳确实参加了江阴要塞起义》一文中予以一一驳斥了——笔者注）所有这些，对江阴要塞起义的有无及其性质造成了严重歪曲和混乱。在党的领导下，华中工委派在要塞的地下交通联络站负责人唐仲衡，地下党员吴广文、王德容、唐秉琳和我是江阴要塞起义自始至终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唐仲衡、吴广文同志已经作古，王德容同志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只有我和胞兄唐秉琳尚且健在。在人妖颠倒的十年动乱中，我因不同意林彪迫害贺龙同志，还由于长期做地下工作，竟被反诬为“三反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等，蒙不白之冤，遭革职批斗，被打成所谓“反革命分

子”。荒唐的年代自当遭到唾弃。今天，我有责任秉笔忆述决定蒋介石反动政权最后溃灭的渡江战役中的重要一节——江阴要塞起义始末，以悼亡去的战友，以铭垂慕之心。

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先后由华中五地委、苏北军区党委、华中工委领导，三野首长和党中央也是深知的。在渡江前一个月左右，华中工委将这项工作交给三野十兵团领导。江阴要塞起义是我们党多年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策反的一次壮举，是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一次杰作，也是我们党在敌营组织领导起义的一次成功范例。江阴要塞起义有力地保障了我军从江阴安全顺利地渡江，迅速切断京沪铁路和京杭国道，加速了国民党江防守备的总崩溃，使京沪杭地区的大部分敌人难以逃脱被歼灭的命运，解放了江南大好河山。〔注：1〕

江水急 锁航要塞封咽喉

滚滚长江，不尽东流。滔滔江水流经南京进入下游，江面辽阔，浩渺宽荡。仅至江阴地段，因受黄山基岩控制，宽阔的江面骤然狭窄，收缩到宽仅千余米左右，形如喇叭。江阴要塞就矗立在黄山之颠，扼守在喇叭颈处。由肖山、黄山、长山组成的要塞区负山枕水，瞰制江北，隔江与孤山相望，和靖江遥对，是吴淞口后的第二道由海入江的江防咽喉，素被称为“锁航要塞”。因其天然的优越地理位置，决定了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据记载，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

春秋时代，吴国季扎就在黄山“筑石室，为烽火之所”，抵御外敌入侵；南宋时，爱国诗人辛弃疾曾在江阴任签判之职；抗金名将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曾率师江阴，屯守江防；元末，朱元璋亲自率兵在江阴大败张士诚；清兵入关后，江阴人民在典史阎应元、陈明遇领导下，坚守八十一天，清兵亡七万五千余人，连损三王十八将，直至弹尽粮绝始被攻破，全城遭屠，仅余五十三个老弱妇幼躲在古庙、枯井中幸免于难。到了近代，一八六四年太平军陈承琦（英王陈玉成之叔）在江阴伏击英军“洋枪队”，全歼八百余人，震惊了李鸿章、戈登之流。黄山修筑炮台始于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至一八九四年洋务派张之洞设立要塞总台官，江阴要塞初具规模。一九三九年，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陈毅同志于茅山东进，就是从江阴渡江北上的。陈老总立马江边，留下了激情诗作：“江阴天堑望无涯，废垒犹存散似沙，客过风兴敌惶急，军民游击满南华。”在一九四九年的渡江战役中，要塞地下党成功地组织领导了江阴要塞起义，又谱写了一页历史新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于一九四五年冬天成立江阴要塞筹建处，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正式挂牌，孔庆桂（中将）任要塞司令。一九四八年六月孔庆桂辞职获蒋介石批准，由蒋军陆军总部少将兵工处长戴戎光继任，随之要塞不断扩充。到渡江战役前，江阴要塞由炮兵总台、一个游动炮兵团、一个守备总队和一个工兵营组成。炮兵总台相当于一个重炮台，下辖三个大台，配备德制、美制重炮四十多门和小口径直射大炮十八门，游动炮兵团下辖三个营，配备五七战防炮三十六门；守备总队相当于一个加强歩兵团，下辖三个大队，兵力约有三千多人；还有要塞司令部下辖的直属分队以

及敌人的特务组织要塞政工室。要塞的建制隶属国防部，但划归第一级靖区司令官丁治磐指挥。担负着由申港——黄田港——君山——黄山——长山——张家港以东之线包括双山沙约二十五公里正面的江防守备任务，并以重炮火力支援江北八圩港敌二十一军桥头堡，对江北实行火力封锁；必要时利用山顶多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坚固炮台和山麓既设工事进行坚守，将两翼部队撤至以黄山为核心的阵地固守待援。江阴要塞被国民党反动政权视为江防支撑点。它西支南京、东援上海、背靠无锡，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生命线——京沪杭地区起着重要保护作用。蒋军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常熟整训会议上讨论认为：“江阴是长江进出口之咽喉，倘若江阴一失，要塞被占，共军强行军六个小时就可抵达京沪重镇无锡，铁路一断，大好江南定失无疑。”故对江阴要塞倍加重视，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要塞地下党在华中工委直接领导下成功地组织了江阴要塞起义，加速了国民党江防守备的总崩溃。

“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在国民党正式建立江阴要塞不久，地下党就在敌人的堡垒里开始了策反活动。

奉指示 打入三厅潜要塞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就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妄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我党我军。一九四六年二月，我正隐蔽在国民党工兵第二十

四团任上尉连长，这个团由重庆开赴南京，住在新河一带，准备转赴华北参加打内战。我自一九三八年二月经唐君照同志在徐州介绍到彭雪枫同志主办的河南确山竹沟训练班学习参加了新四军。毕业后，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分配到国民党军队潜伏以后，战火不断，历尽沧桑，随国民党部队东奔西跑，屡屡要求组织上调我回根据地工作，却又每每要我按组织原来意图继续隐蔽埋伏。这次我决心回苏北根据地搞正面斗争，不想随敌工兵团行动了，我将此意告诉了胞兄唐秉琳，动员他一起回去。秉琳当时在蒋军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第一处任中校参谋股长，是我的四哥。他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高中读书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积极参加了救亡运动，由上海跑到南京示威请愿，在惨遭国民党军警特务的痛打之后，曾作为中学生十三代表之一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欺骗煽动说：“有你们这些爱国学生，中国就不会亡国！我蒋某决心做岳飞，决不当秦桧！政府正在做抗日准备，买飞机，买大炮，前方抗日将士正在流血牺牲，浴血奋战，你们却放下书不读，和政府捣乱作对。真正的热血青年与其请愿胡闹，不如投笔从戎，以武救国，拿起枪杆子从军去！军校对你们敞开大门，来多少，收多少！……”秉琳和当时许多青年满腔热忱投考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同志同班，为黄埔十期炮科学生。秉琳在军校学习期间，家父不幸去世。临终前，给我弟兄留下遗嘱：要务必抗日救国，枪口对内就是不肖子孙。这对我弟兄们的爱国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在抗战中，秉琳越来越痛感国民党的腐败，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我的二哥唐君照（原名唐秉光）是我党1926年的老党员，当时在国民党战干三团任中共地下党特支书记，经周

恩来同志指示，特地绕道湖北咸丰和当时任国民党炮八团营长的秉琳见了面，秘密住了一个星期，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革命方向教育，进一步帮助他认清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本质，鼓励他坚决站到人民一边，这对他走向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当我提出回苏北根据地时，他极表同意。当时国共两党在美国马歇尔的调停下，签有通邮协定，我们按原先规定好的暗语〔注：2〕给在苏北华中五地委任组织部长的唐君照写了封信：“我们在外跑单帮，小本经营蚀了本，做生意很难，希望回家做生意。”请示我们的今后行动方向。在写了这封信之后，我们将行动意图对吴广文讲了。吴广文是我的姨表兄，是黄埔八期毕业生，当时在国防部一厅（人事厅）任上校参谋。他在大革命时期（一九二六年）曾在盐城参加过党的活动，后因组织遭到破坏而失去联系，受到过我党的教育和影响。后于一九二九年考入黄埔八期，一九三三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吴广文虽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但对国民党统治极为不满，常在我们面前发牢骚，故当我们把写信到苏北的事告诉他时，吴当即表示：“如有回信，请告诉我，我们一起走。”

君照接到我们的信后，立即向华中五地委书记曹荻秋和副书记兼社会部部长宋学武同志作了汇报。华中五地委根据党中央、毛主席“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认为我们在国民党军队里已立住脚跟，留在白区比回苏北根据地更起作用，君照以老大唐君鄂的名义给我们来信指示说：“家里生意也不好做，银根很紧。你们在外面还好混些，希望生意做大些，多集些资本。母亲身体不好，很想念你们，二姑奶奶不久将去南京看望你们。”很明显，党仍希望我们留在白区，做“大”生意。并

知道组织上将会很快派人来联系。当我写信回苏北时，立即借口以身体不好请长假辞去连长职务，留在南京等待复信。一九四六年六月，国防部第三厅需要几个管特种兵、筑城和要塞方面的作战参谋，真是巧赐良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分配我到白区做地下工作时，最初就是在国民党的武汉外围田家镇要塞，后进入黄埔十六期工兵科，进作战厅的基本条件是符合的。于是通过秉琳的推荐，经过战术、参谋业务考试，是年秋天，我顺利地打入了国防部第三厅任上尉参谋，后任少校作战参谋，为党做军事情报工作。〔注：3〕这时江阴要塞也正式挂牌了，要塞司令孔庆桂是唐秉琳的老上司，也是江苏老乡，他当炮兵团长时，唐秉琳是他的“亲信”连长，跟随多年，颇受器重，孔庆桂希望秉琳去江阴要塞做他的班底。一九四六年底，根据华中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唐秉琳去江阴要塞始任参谋主任，后任上校守备总队长，最后任炮兵总台长，为策反江阴要塞起义建立了立足点。由于我在国防部第三厅分工办理全国的工兵、要塞作战计划业务，便借用这个公开身份，经常去江阴要塞与其他同志共同进行策反活动。

我们殷切期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二姑奶奶”从苏北来了。一九四七年初春，华中五地委派我的堂侄、中共建阳县上冈区区委委员、副区长唐坚华同志担任秘密联络员来和我们联系了。唐坚华第一次来是一个人先到上海，住在他父亲唐碧澄家里，准备通过唐碧澄来南京和我们联系。唐碧澄是苏北行署行政委员、盐阜参议会筹备主任，由党派往上海做统战工作的。党组织给唐碧澄一封密信，指示“掩护南北联络，搞好江阴工作。”唐坚华抵上海时，唐秉琳正在上海治病，由唐碧澄领着唐坚华在法租界一个姓高的家里和秉琳

见了面。唐坚华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继续留在白区做秘密工作，首先要站住脚跟，取得信任，抓实力，多多地掌握中、上层军官，力所能及地搞些情报，相机发展。”唐秉琳回到江阴，立即把党的这一重要指示传达给我和吴广文。

唐坚华第二次南来约在当年五、六月份，他找我个别谈话时，我因受命在白区单身活动时间较长，尚未解决入党问题，故向他直接提出了入党要求，并告诉他秉琳也有入党要求，请其向党组织转达。当时，在我们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谈话是个别进行的。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唐坚华向组织汇报我、唐秉琳和吴广文的实际情况及表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经苏北区党委讨论，由华东局华中工作委员会批准我和秉琳加入了党组织，介绍人是宋学武、唐坚华。鉴于当时环境和任务的特殊，我们是由华中工委直接发展和领导的地下特别党员。十二月初，唐坚华同志奉命过江，在一个无灯的小黑房间里，我和秉琳在坚华的主持下，举行了秘密的入党宣誓，从此江阴要塞有了三个共产党员，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接着，唐坚华同志传达了管文蔚、陈丕显和曹荻秋同志的指示：“绝对保密，取得信任，掌握兵权，大抓实力，利用敌人的招牌掩护自己，设法架空要塞司令，等待时机。”华中工委的这些指示为要塞地下党指明了基本工作方针。为了保障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顺利进行，组织上在年底决定派唐仲衡同志以“逃亡地主”身份在江阴城里设立了地下联络站。为遮人耳目，组织上把他的全家也送到江阴，使要塞地下党又增加了一名共产党员。一九四八年秋，上级党批准办理了吴广文的入党手续；一九四九年二月，要塞地下党又发展了要塞游动炮兵团团长王德容入党；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根据要塞地下党的提请，三野十

兵团党委又派来了李干、王刚、徐以逊、陆德荣四位同志协助要塞地下党工作，使要塞地下党组织有了十名共产党员，〔注：4〕这十名共产党员犹如十颗“定时炸弹”埋伏在要塞核心，在渡江作战时，一举组织领导了江阴要塞的起义，保障了我军顺利地由江阴地段安全渡江。

解放后，从十兵团来要塞帮助工作的部分同志不理解要塞地下党的活动，曾问过我们：“说要塞地下党有组织，那属于哪个支部？支部书记是谁？党小组长是谁？”甚至怀疑我们几个同志是“几个国民党军官在渡江前找出路的”。提出一些问题或发生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一则这些同志来要塞时间很短，组织上为了保密，没有也无必要告诉他们更多的情况；再则也确未宣布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更不用说属于哪个支部了。组织上曾指示我们不得有横向联系，但在策反工作中，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不但有横向联系，还进行了横向发展。虽无党支部、党小组之名，但我们几个人又是经常在一起碰头、开会，讨论研究上级组织的指示并在工作互相配合，贯彻执行，实际上形成了以唐秉琳为主、以我为辅的领导核心的组织活动形式。因此，说有党小组也是符合实际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特殊组织。我们虽无支部一级组织，但受华中工委的直接领导，并卓有成效地贯彻执行了华中工委的指示和工作指导方针。

江阴要塞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是在党中央拟派渡江先遣纵队时加紧进行的。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认为可以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我人民解放军，对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经过约八个月的作战，我军消灭了敌人七十一万多人，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但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又集中约六十万的兵力对解放区的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

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把战场引向国统区，直接减轻对解放区的压力，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党中央拟派一支先遣纵队从江阴方面突然过江，到江南开辟一个新战场，进行机动作战，直接威胁敌人的心脏——南京〔注：5〕。一九四八年春，华中工委派唐坚华通知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抓紧要塞的策反工作，保证先遣纵队从江阴顺利过江。江阴要塞地下党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的策反工作就是从接受这个紧迫任务加紧进行的。从此，我经常奔走南京与江阴之间，与其他同志一起积极开展了要塞的策反工作。后来，由于党中央决定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进军大别山的战略性行动，吸引大量敌人到中原来。把战争已经引向了国统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原先拟派先遣纵队的渡江作战计划才没有实施。这一战略性的计划变更，直到粟裕同志逝世前不久，我才知道是粟总陈词毛主席建议先遣队不宜过江而改变的。《人民日报》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三版《实事求是，高度负责——记粟裕同志一件事》一文中就记叙了这件事。这一任务解除后，华中工委发出指示，要我们转入正常的策反活动，“抓上层，争取中层，动摇分化下层”，这为尔后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设下了重要布局。唐坚华同志还带来了邯郸电台的频率、呼号，要我们改为短波收听，加强学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

我在江阴要塞进行策反活动的同时，还利用在国防部作战厅（三厅）的工作之便获取了重要军事情报。国防部第三厅是专管作战计划和作战指挥的，是蒋介石最信赖倚重的军事幕僚机构。它的一切军事作战活动，均是遵从蒋介石的指示和意图进行的。三厅下设一处（管作战方略和计划）、二处（管部队调遣和作战指挥）；处下设科，我在一处一科。

获取情报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或参加会议所得，或借阅文件、校对作战文书所录，或在交友中所探，或乘混乱中所取，甚至利用赌博所获。如经蒋介石批准实施的《重点进攻时的全国作战方案及部署》这一绝密情报，一个在三厅二处（作战指挥处）的参谋，在闲谈中说：“又批下来了，老头子（指蒋介石）还要大干一场，调的部队可多了。”我闻之遂热情邀他去吃了顿饭，然后又一起去打麻将，在赌场中故意让他多赢些，一直到天亮，然后我借机抄录了文件。我先后所取得的军事情报，如经蒋介石亲自批准的蒋军进行重点进攻时的《全国作战方案及部署》、《以华东地区为主要战场的作战实施方案》、《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以及《二线补充兵团的实施计划》等重要情报都是由我取得后，赶赴江阴，先后通过地下交通唐坚华、唐仲衡同志及时送回苏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是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秘密回苏北向华中工委汇报工作时，直接面呈管文蔚同志的。

巧争夺 蒋介石圈命司令

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中将）是保定军校毕业的，江苏仪征人。一九四八年五月，孔庆桂乘扩建、修复要塞炮台的工程大捞了一把，又暗中通过油料主任把大量汽油倒卖给无锡的“锡澄汽车公司”，因分赃不匀，油料主任写信向国防部告发了孔庆桂。孔庆桂知道后，立即反手把汽油如数运回，退还了黄金，以免暗中一脚。但他私囊早饱，故主动辞

去要塞司令职务，以享余年清福。国民党军队的官僚是惯于搞手脚的，孔庆桂自不例外。他亲自导演了一幕“造福民众，厥功甚伟”的贴金闹剧，一面组织在江阴建造“孔氏纪念亭”，举行“惜别会”；一面又串通江阴商贾名流飞电蒋介石“府赐慰留”的恳请书。蒋介石在发动全面进攻遭到惨败后，即着手加强江防守备，打算在江阴要塞换一个黄埔系少壮派的司令，接替年迈体弱的孔庆桂，故孔庆桂的辞职申请正合蒋介石的心愿，遂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初批准了孔的辞职，调任国防部空职无权的高级参谋。于是，围绕江阴要塞司令的出缺，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的角逐。

江阴要塞司令一职是个肥缺。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职有权有地盘，那真是财源通海。江阴要塞有千亩良田可以出租；黄田港是南北贸易口岸，可以敲榨勒索；可以用要塞公款在上海做投机买卖；可以大吃空缺，进行贪污、中饱私囊。因此，这个肥缺一出，不少人垂涎三尺，竞相争夺，戴戎光就是其中之一。要塞地下党同志研究认为：国民党军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换一个陌生的要塞司令，非但我们的策反阵地不能巩固，反有失去的危险，这是一场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如能按我们的意愿选择一个司令，于我们控制要塞，取得信任，图谋发展是极有利的。因此，我们决定积极帮助戴戎光进行争夺要塞司令的活动。戴戎光是黄埔六期炮科毕业，曾留学日本，抗战胜利前，由其兄戴克光介绍给参谋总长顾祝同。顾祝同是苏北涟水人，戴戎光是苏北阜宁人，可谓“大同乡”。顾祝同为培植亲信，决定保荐当时任陆军总部兵工处处长的戴戎光任要塞司令。戴戎光和我们是小同乡，且有世交关系，他本人与我的二哥唐君照是中学同学；他的弟弟戴曙光是共产党员，与唐秉琳也是同

学。按照任用惯例，国民党的师长以上高级将领都是由蒋介石在保荐名单上的第一名圈定，并经过蒋介石的“面审”才能决定任命与否。因此，能否在保荐单上名列第一是被获准的关键，而戴戎光虽经顾祝同保荐，名字却排在后面的第五名，是绝无可能被蒋介石圈命的，但这份保荐单只有通过军务局长俞济时的签呈才能呈交蒋介石。我们知道戴戎光竞争司令需要钱，故在江阴“农民银行”领了一笔守备总队的经费，约有三两黄金，由唐秉琳到南京亲自送给戴戎光，表示“要塞的官兵都欢迎你去当司令，要用钱，我们提供。”戴戎光甚为感激。他的大老婆连说：“真是及时雨啊！正在活动司令哩！”随即又通过吴广文和梅含章的关系去活动保荐名单的问题。那时梅含章任陆军总部兵工处的三科科长，吴广文也是该处科长，他们和当时任兵工处付处长的王德容同是黄埔八期的同学。梅含章在一九四三年曾参加“中国青年将校团”秘密组织，拥蒋反何（应钦）准备搞“清君侧”，被人诬指密告为“谋杀领袖，颠覆政府”，遭蒋介石逮捕关押。在梅的整个被押期间，吴广文一直照管其家属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查明“将校团”系“忠蒋反何”的组织，方予“无罪释放，另行安排”。梅因此对吴广文是感激不忘的。当时，保荐名单即将上送蒋介石，吴广文请梅含章通过他的学生即在军务局任上校参谋的朱永坤重新造表，把戴戎光的名字列在第一名，考语也写得最好；戴又用重金厚礼取得俞济时的默契认可，于第二天由俞签呈报送蒋介石。果不出所料，蒋介石照例在首名上画了个圈，戴戎光便成了江阴要塞司令。

戴戎光被圈命之后，极为高兴。按惯例，蒋介石要召见“面审”，看一看戴戎光是何许人也。蒋介石的“面审”完